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81-28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73

Hans汉斯

模因论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比较研究

王依婷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本研究运用模因论(Memetics)作为理论框架，对《红楼梦》的两种经典英译本，即霍克斯(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核心在于考察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s)在跨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复制与传播机制。文章重点区分了两种模因传播策略：一是“基因型”(genotypic mode)，即内容相同而形式各异，强调语义和文化意象的忠实传递；二是“表现型”(phenotypic mode)，即形式相同而内容各异，侧重于通过形式上的嫁接与调适来提升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读性和接受度。研究发现，杨氏夫妇的译本更倾向于基因型传播，力求保存源语的文化内涵与意象，但可能牺牲了部分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相比之下，霍克斯的译本更倾向于表现型传播，通过文化本土化和联想嫁接等策略来增强可读性，但有时会削弱源语文化的独特性。论文最终认为，一部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需要在模因的忠实性(fidelity)与适应性(adaptability)/多产性(fecundity)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文化信息的精准传递与跨文化共鸣的持久性。

关键词

模因论，《红楼梦》英译，基因型，表现型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tics

Yiting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October 5, 2026; accepted: October 30,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Memetics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文章引用: 王依婷. 模因论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比较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81-289.
DOI: 10.12677/ml.2026.14111073

canonica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David Hawkes'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nd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pl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memes in the process of cross-linguistic translation.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wo distinct modes of memetic transmission: the genotypic mode, in which identical content is conveyed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emphasizing the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semantic content and cultural imagery; and the phenotypic mode, in which similar forms convey different content, prioritizing formal grafting and adaptation to enhance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ed text within the target cultur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s translation exhibits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the genotypic mode, seeking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imagery of the source text, potentially at the expense of its acceptability among target-language readers. In contrast, Hawkes's translation demonstrates a greater inclination toward the phenotypic mode, employing strategies such as cultural domestication and associative grafting to improve readability, although these strategies may occasionally diminish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source culture. Ultimat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successful literary translation requires a balance between memetic fidelity and adaptability/fecundity,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ccurat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fostering sustained cross-cultural resonance.

Keywords

Memetic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Genotype, Phenotyp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具有深厚而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该书由曹雪芹创作于 18 世纪中叶，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作品以复杂精密的叙事结构、深刻的哲学思考以及对封建社会衰落的生动描写而著称，其意义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家族故事，成为中国文化、伦理与人性的全景式呈现。其文学价值不仅体现在从诗词曲赋到日常口语等多层次语言运用上，也体现在对爱情、失落、抱负与权力无常等普遍主题的探讨上，这些主题能够跨越时代与文化，引发读者共鸣。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研究与评注最为丰富的作品之一，《红楼梦》长期被视为一部浓缩中国传统价值观、审美观与社会结构的“文化百科全书”，因此，其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

《红楼梦》的英译在弥合中西文化差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英语读者接触这一文学经典的主要渠道。自 20 世纪初以来，陆续出现了多个英译本，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包括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合作完成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1973~1986) [2]以及杨宪益和戴乃迭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994) [3]。两种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霍克斯更强调文化调适，而杨氏夫妇更注重字面与语义层面的忠实，这反映出二者在处理原作语言细节与文化内涵时的不同取向。《红楼梦》英译的意义并不限于语言转换本身，它还推动了中国文化模因(如儒家伦理、传统节俗与诗性意象)的全球传播，促进跨文化对话，并为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然而，如何评价不同译本对原作核心文化意蕴与文学本质的传递效果，仍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这两份译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从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和语言风格等

方面展开比较研究。Gao (2009)对比了这两份英文译本中的文化表达，并指出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以及译者的价值观都可能影响译文[4]。Li 等(2011)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译者风格差异与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关系[5]。叶艳和汪晓莉(2016)借鉴了双关语翻译理论，比较了两个译本对“一唉二唱”这一语言现象的处理方式，并揭示了不同翻译策略在隐含意义的传达和修辞效果的呈现方面的差异[6]。Su (2021)聚焦于隐喻性习语，考察了两份译本中隐喻意象的保留、替换和省略情况，更清晰地凸显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关系，以及译者选择对翻译策略的影响[7]。

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对《红楼梦》英文译本的研究得以对语言特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Chou 和 Liu (2023)采用多维分析方法，考察了两种译本在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中的语体差异，发现霍克斯译本中的人物对话往往更口语化、更具互动性，而杨氏夫妇译本中的对话则相对更具信息量且更具显化特征[8]。Sun 和 Liu (2025)则对比了两个译本前八十回的叙述与对话，重点关注句法复杂性，从而突显了两个译本在语言单位长度及句法结构使用方面的差异[9]。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这两部译本的理解，特别是在文化、修辞和语言等多个层面，并为深入分析译者在文化表达方面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尽管先前研究已对这两部译作的翻译策略、文化取向和语言风格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讨，但仍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现有研究侧重于特定的语言现象或翻译策略，着重描述文化表达在译文中的保留、替换或转化。目前仍需要进行更详细、更全面的探究，以考察在跨语言传递过程中，特定的文化信息如何在外部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仍能保留其核心意义，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文化意象和语用功能。特别是在具有复杂文化内涵的文学表达中，语言形式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意义的丧失，而维持原有形式也并不能保证能够充分传达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能够同时关注文化信息延续与变异的理论视角。

模因论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该理论以能够传播和复制的文化信息为研究对象，并以这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筛选、复制和变异过程为核心。若把《红楼梦》的翻译视为模因复制与传播的过程，研究者便可以系统考察其中的文化要素，例如“玉皇大帝”意象、“葬花”习俗以及诗文典故如何在英文中被选择、调适与重新语境化。模因论不仅能够为不同译本的比较提供更细致的分析视角，还能够揭示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互动。由此，它可弥补既有研究的部分不足，为评价《红楼梦》的跨文化传播成效提供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深化对文学、文化与翻译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2. 模因论与翻译理论概述

2.1. 翻译模因论概述

1976 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畅销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10]中提出“模因”(meme)这一文化传播单位的概念。事实上，尽管文化传播与生物遗传具有某种类比关系，但模因并不是基因的派生物。正如许多科学定义常借助隐喻建构一样，把文化复制因子与生物遗传因子相类比，只是一种研究工具[11]。作为各自独立的复制因子，模因与基因分别是同一类复制现象在文化领域和生物领域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二者彼此独立、平行存在，不存在起源上的上下位关系或寄生关系。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模因长期以来一直客观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可视为生物基因在文化层面的对应物，而非由隐喻派生而来的附属性术语[12]。

模因论是研究文化传承、演化与变异的理论。模因是一种类似于基因的文化现象：基因通过遗传实现复制，模因则通过模仿实现传播。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模因指通过模仿行为得到广泛传播的文化信息。何自然(2005) [13]指出，语言模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复制和传播，即“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传播，以及“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传播。只有少数在长寿性、多产性和忠实性方面表现较高的模

因，才能发展为强势模因。按照切斯特曼关于“翻译模因”的观点，某一文化单位一旦进入传播过程，便具有成为模因的可能；同理，一个语言单位一旦跨越不同语言语境持续传播，也就可能成为翻译模因。模因因此可以被视为文化翻译的基本单位，其内在运行机制会影响乃至制约具体的翻译过程[14]。

在交际活动中，人们往往会直接模仿、复制、联想或类比自己接触过且印象深刻的语言信息，以获得受众认同。一旦这类语言信息获得受众的认可与支持，人们便会竞相仿效，在复现他人话语的同时，对形式或内容作出一定变异，使其能够进一步复制、扩散并流行。语用学中所说的语言模因，正是指这类可被模仿、复制和传播的语言信息，包括词语、句段乃至篇章的形式或内容[15]。

在同化阶段，一个模因若要找到合适的宿主，通常需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能够吸引宿主注意、能够被宿主理解，并且能够与宿主既有的知识结构相容，从而获得接受。当宿主注意、理解并接受一个新模因后，模因便进入记忆阶段。模因在记忆中保留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被宿主进一步传播。如果模因仅停留在记忆阶段，其复制过程便会中止；只有当模因能够以其他潜在宿主可感知的外显形式被表达出来时，才有可能进入最终的传播阶段。总体而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时受到模因自身生存能力、宿主模仿能力以及宿主主观传播意愿的影响。

道金斯(1976) [10]认为，模因与基因一样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原则。只有能够适应生存环境，并在忠实性、多产性与长寿性方面达到较高水平的模因，才更有可能延续下来，这类模因通常被称为强势模因。冯建明和莫爱屏(2019) [12]指出，一个模因能够顺利传播，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优秀”或“正确”，而在于它是否恰好与宿主及其周围环境相匹配，从而能够在其所依赖的文化土壤中更有效地运行。从这一意义上说，多产性也可被理解为一种适应能力。然而，模因论也存在争议。Sperber (2001)指出，在文化信息传播中观察到的相似性和稳定性，并不足以证明此类信息经历了与生物基因复制类似的过程，因为文化信息的再生产往往基于个体已有的认知结构，以及他们对该信息的理解和推理[16]。Atran (2001)则从认知科学的视角强调文化信息的高保真传递绝非普遍现象，文化的传播不仅涉及简单的模仿，还受人类认知机制的制约，并伴随着持续的变异与重构[17]。因此，在将模因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译者的主体性、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文学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将翻译视为机械复制。

2.2. 模因分类

2.2.1. 基因型模因

一种观念或信息模式一旦得到传播并被他人模仿，便可能成为模因[15]。相同的信息可以持续穿越不同语境，并以不同形式存在。Blackmore (1999) [18]在讨论模因演化时指出，那些主要传递信息内容、并储存在人脑中的模因，可以与基因型模因相对应。基因型模因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是“相同信息直接传递”[11]，即在不改变核心内容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和传播，其形式包括引语、口号、改写或复述等。另一种方式是“相同信息异形传递”[19]，即信息的核心主题保持不变，而具体表达形式呈现多样化。

2.2.2. 表现型模因

表现型模因主要有三种传播方式，即同音异义横向嫁接、同形联想嫁接和同构异义横向嫁接[11]。同音异义横向嫁接是指保留成语、谚语、俗语、名句、诗句等既有语言形式或结构模式，同时以同音词或近音词替换原有词语，使新的表达在语音上与原式保持相同或相近，但意义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交际需要。简言之，这类语言模因的意义不同，但声音相同或高度相似。

同形联想嫁接是指语言形式保持不变，而其意义会随着语境变化而发生转移[19]。具体而言，同一语言形式被“嫁接”到不同情境中时，会激活不同的联想意义。

同构异义横向嫁接是指语言模因的结构和形式基本保持不变，而具体内容发生变化，并由其他词语

进行替换[19]。换言之，它通过模仿某一相对固定的语言结构来生成新的模因变体，变动的主要是结构中的具体内容，而框架本身通常保持稳定。

《红楼梦》文化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从模因论视角，对霍克斯译本和杨氏夫妇译本中的仿拟性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两种译本整体的翻译处理。从国内外相关社会语言现象与语言学研究可以看出，模因与文化传播具有高度相关性。译者经历表达阶段后形成的译文结果，对于模因能否继续传播至关重要，而表达阶段的核心在于译者的解码与编码。本文采用实证分析与译本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基因型与表现型两种模因复制和传播方式出发，考察两位译者的解码与编码过程。

3. 《红楼梦》英译中的文化模因分析

何自然(2021) [15]指出，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倾向于直接模仿、复制、联想或类比自己接触过且印象深刻的语言信息。这类语言信息由此获得受众关注与认同；一旦进一步得到认可与支持，人们便会竞相仿效，在复现他人话语的同时，对其形式或内容作出一定变异，使之能够继续复制、扩散并流行。语用学中所说的语言模因，正是指这类可被模仿与传播的语言信息，包括词语、句段和篇章的形式或内容。

从较大程度上说，翻译的目标之一，是使源文本能够获得更广泛、更有影响力的传播。模因论关注如何使语言获得较高的长寿性、忠实性与多产性，因此能够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经典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读者群，以及中华优秀文化内涵的跨文化传递，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下文将以模因论为理论依据，对霍克斯与杨氏夫妇的两个经典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剖析两种译本主要采用的模因翻译策略，探讨其所传达的深层文化内涵、译者选择相关策略的原因及其所达到的效果，以期为《红楼梦》翻译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3.1. 文化意象与文化概念模因

例 1：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杨宪益&戴乃迭译：After no one knows how many generations or aeons, a Taoist known as Reverend Void, searching for the Way and immortality, came to Great Waste Mountain, Baseless Cliff and the foot of Blue Ridge Peak.

霍克斯译：Countless aeons went by and a certain Taoist called Vanitas in quest of the secret of immorality chanced to be passing below that same Greensickness Peak in the Incredible Crags of the Great Fable Mountains when he caught sight of a large stone standing there.

杨氏夫妇将“空空道人”译为“Reverend Void”。这一处理为基因型模因的传递，“Reverend”指宗教修行者，“Void”与“空空”的语义相对应，同时也能够唤起佛教“诸法性空”这一核心观念。霍克斯则把“空空道人”译为拉丁词“Vanitas”。这一选择能够使人联想到《圣经·传道书》中“虚空的虚空”所构成的宗教文化意象，同时与萨克雷的 *Vanity Fair* 以及西方“虚空画”(vanitas painting)传统形成跨文化联结，可视为表现型模因的同形联想嫁接。西方读者接触“Vanitas”时，较容易将其与自身文化中既有的“虚幻”“虚空”等概念联系起来。该策略借助同一语言形式“Vanitas”激活读者熟悉的文化符号，从而降低理解陌生中国文化概念的门槛。

例 2：“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灭火时”。

杨宪益&戴乃迭译：“Fool, to care for this tender child: An image in the mirror, snow melting away. Beware what will follow the Lantern Feast. The vanishing like smoke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霍克斯译：“Fond man, your pampered child to cherish so—That caltrop-glass which shines on melting snow! Beware 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 When all in smoke and fire shall pass away!”

杨氏夫妇主要采用基因型模因“相同信息异形传递”的方式，优先保留判词中的警示意义与核心意象。霍克斯则通过表现型的同形联想嫁接进行调适，以增强英语读者能够感知的诗歌节奏与意象联想，同时对部分文化意象进行本土化处理。例如，“元宵”在霍译中被处理为“fifteenth day”，以贴近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认知。相比之下，杨译使用“Lantern Feast”，更优先保留源语的语义与文化内涵。

例 3：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污秽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

杨宪益&戴乃迭译：Even worse are 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 who corrupt the young with pornography and filth.

霍克斯译：Still worse is the “erotic novel”, by whose filthy obscenities our young folk are all too easily corrupted.

杨氏夫妇主要采用基因型模因“相同信息异形传递”的方式，保留了“风月笔墨”的文化标签及其批判指向。霍克斯译文则通过表现型的同形联想嫁接，将这一概念简化为英语读者更熟悉的“erotic novel”，从而降低理解门槛，但相应削弱了文化特异性。杨氏夫妇较完整地覆盖了原文的批判逻辑与核心信息。“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t school”与“风月笔墨”形成对应：其中“breeze-and-moonlight”对“风月”作较为直译的处理，“school”则对“笔墨”所指涉的文学类型或流派作显化说明，从而较准确地保留了“某一特定低俗文学类型”这一核心所指。霍克斯译保留了“批判低俗文学并指出其对青年有腐蚀作用”的核心意义，但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简化。“Erotic novel”对应“风月笔墨”，将带有中国文化属性的特定文学表达转化为英语语境中以情欲描写为主要特征的小说类型。尽管这一处理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原文的批判对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风月”所蕴含的借风雅之名掩饰低俗内容的讽刺意味及其文化内涵。

3.2. 熟语与修辞结构模因

例 4：“然后好携你到那隆盛昌明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立业。”

杨宪益&戴乃迭译：“Then we can take you to some civilized and prosperous realm, to a cultured family of official status, a place where flowers and willows flourish, the home of pleasure and luxury where you can settle down in comfort.”

霍克斯译：“After that I shall take you to a certain brilliant/successful/poetical/cultivated/aristocratic/elegant/delectable/luxurious/opulent locality on a little trip.”

首先，杨氏夫妇的处理符合基因型模因“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特征。就意义而言，杨译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四组并列场景；在结构层面，尽管译文没有采用汉语四字格，却通过“to…/to…/a place…/the home…”等平行结构，部分恢复了原文“四景并列”的组织逻辑，并未完全破坏其排比框架。霍克斯译文则采取了带有同形联想嫁接色彩的表现型重构，通过堆叠“brilliant/successful/cultivated/elegant/luxurious/opulent”等多个形容词，传达“繁华富贵”的整体感受。

例 5：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杨宪益&戴乃迭译：“A centipede dies but never falls down”, as the old saying goes.

霍克斯译：“Haven’t you ever heard the old saying, ‘The beast with a hundred legs is a long time dying’?”

杨氏夫妇优先保存了基因型模因中的原有意象与比喻意义。在意象层面，译文较准确地还原了“百足之虫”所具体指涉的“centipede (蜈蚣)”；在语义层面，也完整保留了“虽死而不倒”的核心逻辑。霍克斯则主要借助同形联想嫁接，利用英语读者熟悉的“动物 + 负面或衰败状态”类谚语认知图式，使读

者较快联想到“虽已衰败却尚未彻底终结”的意义。英语文化中常用具体动物来描写某种顽强或持续的状态，例如“a dog with a bone”可比喻对某事执着不放。“The beast with a hundred legs”符合“动物 + 特征”的常见认知模式。读者看到“beast”与“a hundred legs”的组合时，容易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从而为理解其隐喻意义奠定认知基础。在语义联想层面，“is a long time dying”是英语中可用来描写“某事物虽在衰败、却不会迅速终结”的表达。读者接触这一表述后，能够将其与前文“beast”所唤起的“顽强”认知结合起来，较快把握“衰败而未完全崩溃”的核心含义，无须额外解释“百足之虫”这一文化意象，从而实现将陌生谚语嫁接到熟悉认知图式上的效果。

3.3. 人物称谓与社会关系模因的语用适应

例 6：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破皮破落户，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杨宪益&戴乃迭译：“You don’t know her yet.” The Lady Dowager chuckled. “She’s the terror of this house. In the south they’d call her Hot Pepper. Just call her Fiery Phoenix.”

霍克斯译：“You don’t know her,” said Grandmother Jia merrily. “She’s a holy terror this one. What we used to call in Nanking a ‘peppercorn’. You just call her ‘Peppercorn Feng’. She’ll know who you mean!”

杨氏夫妇主要采用基因型模因“相同信息异形传递”的方式，较准确地还原了王熙凤“泼辣、放诞、强势”的人物性格。“The terror of this house”对应“有名的一个破皮破落户”。尽管“terror”字面义为“恐惧”，但置于具体语境中，可以理解为“令人敬畏、不能轻易招惹的人”，从而传达出“泼辣、不受拘束”的隐含性格。“Hot Pepper”对应“辣子”，“Hot”与“pepper”的辛辣感官刺激直接相关，并可隐喻尖锐、泼辣的性格，与“辣子”的比喻义较为契合。杨氏夫妇还把人物名称与性格隐喻结合起来，尽力保留“凤”与“辣子”之间的联系。“Fiery Phoenix”对应“凤辣子”：其中“Phoenix”对应“凤”，而“Fiery”延续了“Hot Pepper”中所包含的火辣、强势特征，从而在名称与人物性格隐喻之间建立联系。

霍克斯则更多使用英语读者熟悉的口语形式，以迅速激活“难缠、厉害”的人物认知。“a holy terror”是英语家庭口语中较常见的表达，例如可用来形容特别调皮、难以管束的孩子。读者看到这一短语时，容易直接联想到“很难对付的人”，因而无须额外解释“破皮破落户”的含义。虽然“peppercorn”在性格隐喻上的力度较弱，但作为常见调味品，其具体、熟悉的形象也有助于减少读者的陌生感。在句法结构上，霍译中的“You just call her ‘Peppercorn Feng’. She’ll know who you mean!”采用“you just call her…/She’ll know…”这一口语结构，符合英语中介绍绰号或称呼时的自然会话逻辑。借助这种熟悉的表达方式，读者能够迅速理解说话人是在教对方如何称呼某人，从而增强译文的流畅性。

例 7：“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杨宪益&戴乃迭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 but looks more like a Jia. 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 ever talking about you.”

霍克斯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 Grannie. She’s more like a Jia. I don’t blame you for having gone on so about her during the past few days.”

杨氏夫妇主要采用基因型模因“相同信息异形传递”的方式，尽量保留“外孙女”与“亲孙女”之间的亲属关系区分，以及原文借比较关系进行恭维的逻辑。霍克斯译文则通过表现型调适，把复杂的亲属关系表达简化为更符合英语读者认知习惯的说法，但同时弱化了原文部分奉承性的细节。霍克斯主要借助同构异义横向嫁接，利用英语中简洁的“X 不像 A，更像 B”比较结构来处理亲属关系。句法上采用

“She doesn’t take after A. She’s more like B.”这一英语中常见的相貌比较模式，用于描述“一个人不像某位亲属、而更像另一位亲属”。在语义层面，“your side of the family”填入 A 的位置，“a Jia”填入 B 的位置。借助这一相同结构，原文中较复杂的亲属关系，即“老祖宗的外孙女儿”与“嫡亲孙女”，被简化为“你们那一边”与“贾家”之间的直接对比，更符合英语表达中弱化复杂亲属称谓、突出核心关系的习惯，也避免了过于冗长的解释。

4. 结语

本文以模因论为理论框架，对《红楼梦》两英译本的例证进行比较分析，以考察霍克斯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在处理文化意象、文化概念、熟语修辞及人物称谓等方面所采用的翻译实践。所选译例表明，这两种译本在编码文化模因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杨氏夫妇主要依靠通过基因型模因进行语义传递，以保留源语的核心意象、文化标识和语义关系。霍克斯则更多地依赖表现型模因的形式重构以及联想嫁接，来调整原文本的文化概念、修辞形式和语用表达。根据模因论，强势模因通常应具备较高的忠实性、长寿性与多产性。从强势模因与弱势模因的角度看，杨译与霍译各自呈现出不同特点。杨译更擅长保存源语文化模因的“忠实性”，但在面向目标语传播时的“适应性”相对较弱；霍译则通过强化目标语文化中的“适应性”来提升传播能力，但这可能以降低源语文化模因的“忠实性”为代价，并有时会削弱源语文化的独特性。尽管这两种译本都在保留文化信息与适应目标语言之间取得了平衡，但所采用的具体策略仍需结合模因类型及其在源文本中的功能进行分析。

针对不同类型文化模因的翻译策略，不应笼统地基于以源语忠实或目标语适应作为统一标准，而应根据相关模因的文化负载程度或语义功能来进行选择。对于具有一定跨文化共通性的主题模因，如兴衰无常、人物性格评价等，翻译应优先保留其核心信息和语用功能，同时运用目标语言中适当的句法或修辞形式来重构表达。对于文化特有模因，如“空空道人”“元宵”以及表示特定亲属关系的称谓，翻译应优先保留体现源语文化特征的关键信息，同时根据语境采用语义显化、适当解释或必要注释来补充文化背景。对于像“风月笔墨”或“风辣子”这样既具有文化特异性又具备跨文化可理解性的复杂模因，译者可考虑采取一种既保留核心文化意象，又同时保留语用功能的翻译策略。

综上，本文从模因论视角比较分析霍克斯与杨氏夫妇的《红楼梦》英译本，并以模因翻译策略为切入点，考察两类译者较为偏好的翻译选择。研究以模因传播过程作为总体框架，并进一步借助基因型与表现型两种模因复制模式，分析译者的解码与编码机制，对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因进行分类考察，为翻译实践提供参考与启示。

参考文献

[1] Moratto, R., Liu, K. and Chao, D.K. (2022)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 Hawkes, D. (197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I: The Golden Days. Penguin Books Ltd.

[3] Yang, H.Y. and Yang, G.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4] Gao, Y. (2009)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ian Social Science*, **5**, 112-117. https://doi.org/10.5539/ass.v5n3p112

[5] Li, D., Zhang, C. and Liu, K. (2011) Translation Style and Ideology: A Corpus-Assisted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6**, 153-166. https://doi.org/10.1093/llc/fqr001

[6] 叶艳, 汪晓莉. 《红楼梦》“一喉二歌”语言现象英译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38(1): 46-58, 133.

[7] Su, K. (2021) Translation of Metaphorical Idioms: A Cas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meng. *Babel.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tradu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67**, 332-354. https://doi.org/10.1075/babel.00222.su

[8] Chou, I. and Liu, K. (2023) Style in Speech and Narration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A Corpus-

Based Multidimensional Study.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6**, 76-111. https://doi.org/10.1075/target.22020.cho

[9] Sun, Y. and Liu, K. (2025) Stylistic Nuances through Syntactic Complexity: A Corpus-Assisted Study of Narration and Dialogue in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Applied Corpus Linguistics*, **5**, 100125. https://doi.org/10.1016/j.acorp.2025.100125

[10]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束定芳. 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J]. 外国语, 1996(2): 9-16.

[12] 冯建明, 莫爱屏. 模因三论与文化进化研究[J]. 外国语, 2019, 42(2): 54-61.

[13]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 4(6): 54-64.

[14] Chesterman, A.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btl.22

[15] 何自然. 语言模因中的元语用意识[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21(1): 41-47.

[16] Sperber, D. (2001) An Objection to the Memetic Approach to Culture. In: Aunger, R., Ed., *Darwinizing Culture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3-173.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2632449.003.0008

[17] Atran, S. (2001) The Trouble with Memes: Inference versus Imitation in Cultural Creation. *Human Nature*, **12**, 351-381. https://doi.org/10.1007/s12110-001-1003-0

[18] Blackmore, S. (1999)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何自然. 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